


《技术大全》摘录——人类文明的境况：来自1966年的白日梦、遐想与脑洞

 朱俊帆 评论 技术大全
2023-08-08 16:09:29 已编辑 江苏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1-4

我们和列维—斯特劳斯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他想要证明的是，就算是和我们最不一样的文明，哪怕是非技术的文明，其存在都一样合理合法，我们不应该对它们进行价值评判，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有些文明在上述“游戏”中足够幸运地抵达了启动链式反应的临界点，就觉得有些文明“高于”其他文明。

“灵生代”转瞬即逝的原因，冯·赫尔纳列出了四种可能：（1）地球上所有生命灭绝。（2）只有高度组织的物种灭绝。（3）心理或物理上的衰退。（4）失去技术兴趣。给这些原因附加了粗略的概率系数后，冯·赫尔纳假定文明的平均寿命为六千五百年，文明间的平均距离为一千光年。他的计算结果也让他认为，我们第一个会接触到的外星文明，它最可能的年龄是一万两千年。而第一次就能接触到与地球发展阶段相匹配的文明，这样的概率更加渺茫：只有0.5%。此外，冯·赫尔纳也考虑了同一星球上文明重复出现和消失的可能性。

星球上的社会统一现象，技术演化将会消除社会中的对立主义和独裁主义。有鉴于驯服自然比全球范围内管制社会更容易，技术演化取代社会演化也许确实是这类过程的典型动态特征。很难接受的是，与控制自然力量相比，延迟社会力量的管制在宇宙中始终保持不变，因此这是所有可能文明的固有性质。但这个延迟的尺度，作为一个重要参数，是地球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它塑造了星球上人类统一的进程，结果造成了两大对立集团的出现。

现在世界很大一部分社会盛行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从而产生了社会“衰退”的倾向。接下来，我们也要说说发展的“乐观主义驯服法”的可能性，以及“技术加速”循环的可能终止。

一只“愚蠢”的老鼠，不愿意学习，它会仔细检查它遇到的食物。而一只“聪明”的老鼠，发现总在相同时间地点发现食物，似乎更容易生存。但是如果食物有毒，“无法学习”的“愚蠢”老鼠会凭借着天生的多疑打败“聪明”老鼠，而后者将会被毒死。不是每种环境都有利于“智能”。总的来说，经验的推广（它的“传递”）在地球环境中非常有用。然而到其他环境里这项特质将会成为劣势。

巨大的“智力潜能”，从早些时候似乎就为建立文明而存在的过度潜能，面对演化在两个矢量之间不断概率性地博弈：突变压力和选择压力，它是以何种方式出现在这一过程中的？演化论无法就这个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经验表明，几乎每个动物的大脑都表现出巨大的“过度性”，这表现为动物处理日常生活中不常遇见问题的能力，一般都是科学家们在实验中给出的任务。

种技术进步的“惯性”效应（受驱动于早已积累但尚未利用的科学成果）最终将会停下来，之后我们便会遭遇发展危机。当我们经历星球级别的“科学饱和”时，由于缺乏足够多的人，那些需要探究却被忽视的现象会越来越多。理论知识的增长不会彻底停止，但会时不时暂停。我们能设想这样一种文明吗，科学发展耗尽了所有的人力资源，但却仍需要人来发展文明？

先前的观点不是文明败落的预言。只有将未来理解为指数级的现在时，除了正统演化之路外，看到其他发展可能的人，才会接受这些观点。他们相信任何文明都类似于我们的文明，在过去的三百年内经历快速发展，否则根本就不能算是文明。发展曲线的陡然上升变化，转变为“饱和”曲线的转折点代表着系统动态特征的变化，那就是科学。科学不会消失：唯一会消失的只是它当前发展无极限的形态。科学爆炸阶段是知识文明历史的一个台阶。

恒星就像能源机器，而文明既是能源机器，也是信息机器。这就是为什么就其发展形势而言，恒星要比文明更能准确预测。这不代表文明发展无极限。但是，唯一的差异在此：文明拥有能源“自由”，一直到它撞上“信息壁垒”。总而言之，我们有获取宇宙中可获得性资源的渠道。



豆瓣豆品18月会员积分艺术家
豆瓣豆品

广告

> 技术大全



作者: [波兰] 斯塔尼斯瓦夫·莱姆
出版: 北京日报出版社
定价: 118.00元
装帧: 精装
页数: 708
时间: 2022-2

> 侵权投诉通道

文明和自然处在相互敌对的位置。我们对于博弈的第一阶段相当熟悉：即文明做出的博弈导致科学和技术的扩张性发展。在第二阶段，我们遭遇了信息危机。文明有可能克服危机，赢得这一阶段的胜利，也可能失败。而且它们还有可能打成平手，这将是一种妥协状态。胜局意味着创造出任何能力渠道，无论多大。利用控制论创造“人工科学家大军”，听上去颇有前景，但也只是第一局的延续性策略。科学本身的结构在这里不会经历任何重大变化；只是由“智能电子强化兵”捍卫科学前沿。与之相反的则是一种相当传统的方案。“人工合成研究人员”的数量不可能无限增长。由此一来，我们能够挡住危机，但是无法战胜危机。真正的胜局要求完全重构作为获取和传播信息的科学。如今，通过许多控制论专家，我们能够设想为构建更加庞大的“智能放大器”（它们不仅仅成为科学家的“盟友”，更得益于其超越人类大脑的“智能电子”超能力，很快就会将人类科学家甩在后面），或者还能设想为与我们当下讨论的内容完全不同的任何形式。

博弈的第二种结果就是平局。每一种文明会为自己创造出一种人工环境，在其星球表面、内部和相邻宇宙空间内扩散。但是这一过程不以任何剧烈方式与自然割裂，它只是逐渐远离自然。这一过程能够持续下去，最终在整个宇宙中形成一种文明“胶囊”。这样的“胶囊”可以通过控制论的特殊应用来实现，将有助于“堵住”多余信息，并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信息。这种文明的结局首先完全取决于其对自然反馈的调控性影响。我们将不同自然现象（煤炭氧化、原子裂解等）置于反馈关系中，一路走来走到了太空航天工程这一步。经历信息危机且已掌握自然反馈和可保证其延续千百年能源的文明，是不可能同时意识到“自然信息潜力是会耗尽的”，持续当前策略可能招致失败（因为不断向“自然内部”挺进终将导致科学因其自身的高度专业化而分崩离析，有可能破坏其内稳态而最终失控），因此，这种文明将能够从自身内部出发，建构一种全新的反馈类型。要产生如此的“文明胶囊”就必须构建“世界中的世界”，一种自主显示，不必和自然的物质现实建立直接连接。“控制论—社会技术”外壳的出现会将文明封装在自身之中。后者将会继续存在并发展，但是其生存发展方式不再被外部观察者所见（尤其是外太空的观察者）。

失败的可能性。如果一个文明无法克服自身的危机，那会发生什么？它会从研究“万事万物”（正如我们现在的状态）的文明转变为只聚焦于某些精挑细选的研究方向的文明。随着每一研究方向逐渐开始经历人力资源的匮乏，这些研究方向的数量将会稳定下降。逐渐接近自身能源耗尽的文明，毫无疑问，会把研究活动集中在某一领域。资源充沛的文明则能够多点开花。

当然，我们能够展示，在到达平衡的过程中，每一种内稳态是如何在实践中经历“短路”，结果就是系统最终获得永恒的平衡，尽管这得益于无法验证或者虚假信息。从这点来看，信仰将填补内稳态所呈现的所有智性论和存在主义弱点，最终胜利地被允许存在于系统中。你问，这里是不是不公平？任何事物都将在“那里”得到补偿。那么“这里”有很多事物我们无法接受吗？“那里”我们将抓住一切，然后，我们就会接受它，以此类推。但这一整套解释无处安置，因为揭示信仰的补偿性成因并不会废除其所有主张。即使我们能够证明，借助信息论的数学工具，证明内稳态调节器如何创建浅薄的形而上存在模型，证明神学如何在其中发展，这一论点无法解决这些术语代表的真实存在（比如上帝、永恒的生命、天意）。既然我们在寻找印度的时候成功发现了美洲，在渴求炼金术士的黄金时发现了中国，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寻找科学提供的解释时发现上帝，而非验证我们的自身存在呢？接下来，控制论专家要做什么？只剩下一件事了：构建非人类的内稳态调节器，有能力同时“创造”出形而上学。我们在这里指的是实验形而上学，就是建模一种动态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信仰自发出现在自组织系统内。（我们大脑中所想的是，其自发性出现，而不是事先编程好的，是基于那些潜在的内稳态调节器，其目标是以最佳状态适应地球生活条件。）

每一种此类内稳态调节器“通过自身局限性摆脱了形而上学的认知条件”，因为它能够表达在自身永恒存在中学习“万事万物”的愿望。然而，鉴于这样做只是消除了形而上学的认知原因，而非补充原因，这样的内稳态调节器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它自己的无限存在恰是阻碍它进入“更好世界”的障碍，自杀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6

没有一个文明能够“完全幻影化”。如果从某个点开始，一个文明的所有成员都进入了幻象，那么该文明所处的真实世界就将陷入停滞，并最终消亡。因为即使最美味的幻影美食都无法延续真正的生命（虽然可以通过将特定的脉冲信号传导入神经来产生饱腹感！），人在幻影世界中待的时间足够长以后总要摄入真正的食物。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某种可以覆盖整个星球的“超级幻影机”，该星球上的居民“永远”——也就是说，只要他们还活着——与机器相连，而他们的身体则像植物人一样，由自动设备来维持生命（比如，将营养物质输送到血液中）。自然，这种文明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噩梦。但是，决定这种文明能否存在的并不是它看起来像不像噩梦，而是其他的因素。这种文明只能存在于一代人之内——与“超级幻影机”相连接的那一代。因此，这将是安乐死的一种特殊形式，一种文明在愉悦中自杀的行为。

7

别想着财产权了。如果我说一个时代终结了，我压根不会去想旧系统的消亡。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是一项必要任务，为最终考验做准备，它是成熟时代的开始而非终结。

到了一定的复杂程度后，建造拥有表面上重要变量的动态耦合模型成本很高。知晓模型的应用范围很重要，也就是说，多大程度上代表着实际现象行为。重要变量的选择不意味着要放弃准确度。恰恰相反，在保护我们免受无关信息侵扰的同时，选择变量能够让我们更快探测与检视现象类似的整类现象，换言之，更快地探测理论的建造。

为什么单个大脑没有连起来构成一个系统？科学不就是这样一种高级系统吗？它是，但只是比喻。如果我理解了什么东西的话，我将其作为整体理解“这件事”，从头到尾。个体大脑联合起来，创造出某种“高级智能领域”，这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其中形成的真理形式无法被任何一个个体的大脑所全部包含。科学家当然合作，但在最后一种情况下，一个人必须构建出设立的问题的解决方法，因为“科学家大合唱”办不到。

可以在“种植”过程中植入某种“具体的拉马克主义”。众所周知，拉马克关于传递遗传性状的理论与生物学中实际发生的并不吻合。传承“获得性性状”可以用到信息演化中，来加速“理论概括”的形成。我们已经谈过了“结晶化信息”，但同样肯定是那些“携带理论”的微粒构成不同的物质（聚合物）。也可能最后它们和有机体在某些方面将非常相似。我们也许不该从微粒开始，而应该从相对大的集合体甚至是“伪有机体”，也就是“表型”（这提供了真实现象的信息记录）开始，并且努力让表型发展其自身的“概括”，“理论化概述”或者“基因型理论”——再讲一次，这和生物学中实际发生的情况相反。

我们的遗传语言展示的因果有效性远远超出了形式和数学探索的边界。一颗卵子的发展既不是“同义反复”过程，也不是细胞核中“公理和转换法则集合”的“演绎”结果。我们的形式化行为总是处于规则的最高水平，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操作我们才能持续肯定我们发现的确定性，而演化的方式与我们的完全相反。染色体预测式的“计算”没法负担规则的“奢侈性”，因为它不在纸上展开，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这就是为什么物质通过信号控制产生因果作用的所有状态必须要被它全部考虑到。因此可以说，一个有机体借助其繁殖细胞先验地传递合成判断，因为大部分这种判断是真的（至少在实用主义层面上是的，如我们之前提出的一样）。

那个世界的物理学家只能通过比较我们的真实世界和他们的世界来发现创造（或者“已被创造”）的事实。只有那时，他们才能发现，相比于他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短暂存在的现实层面（毕竟他们由电子脉冲组成，而那只是构成我们世界物质形成的脉冲的一种）。具体地说，一个被创造的世界也许是一场非常稳定、非常长和内部自洽的梦境，这场梦没有人在做，它在“数码机器”中“梦见自己”。

让我们再看看套娃世界的分级，那是觉得我们的世界不够完美的星际文明决定的结果。那个文明开始创造二号“胶囊”世界。但几百万年后，里面的居民对生活条件不满意，希望他们的后代有更好的未来，于是又为他们创造了三号世界——在他们的世界内部，用自己的材料。我们可以把这些从属世界称作“宇宙改善器”“罪恶纠正器”“本体论修复器”或者随便什么名字。可能在其中一个里，最终会出现适当的完美存在，使得宇宙中任何进一步的创造性活动都终止了。这一活动总会结束，因为第十万号世界没法把他们的儿女弄到原子表面生活。

8

看来我们实际上并非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恰恰相反，我们消灭了那一曾是我们近亲的特别生命形式。这不是说我们是谋杀犯或者贪婪的进食者，因为生存斗争可以采取多种不同形式。尼安德特人和原人的关系如此亲近，那些部族应该有过杂交，这很有可能。然而，尼安德特人由于其头骨的巨大尺寸比我们的要大许多而显得如此神秘，即使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文明，但还是随着文明一起消失了。原人也创造了一种新文明。（在地质意义上）过了很短的一段时期之后，技术发展的首个正式阶段开始了：几千年来的各种文明，主要集中在亚热带。但这与人类和社会团体形成经历的上百万年相比，只不过是短短一瞬。

人类能够打败自然：后者只会构建某些可能的“稳压器”，而我们在获得必要知识后，能够全部建造出来。

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试图创造“机械精子”/“赛博精子”，通过挖掘外星球的地表，利用行星构建物质创建我们需要的机器。一场“突变”会让机器变成废物。演化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作为统计学设计者，它不允许自己孤注一掷：它的赌注就是种群。这是工程师无法接受的解决方案：他是否应该在星球上开发出一片“发育机器森林”，只有到那时选择其中最有效的出来？但如果任务涉及设计拥有过比基因表型复杂程度更高的系统，比如能够事先编程“遗传知识”的系统，就和我们之前讨论的一样呢？如果在超过了一定阈值之后，复杂性增加自动增强突变性，我们可能得到的是一个精神有障碍的婴儿，而不是量子力学专家婴儿。

科学家徒劳无功地努力缩窄自己的研究范围，这样就变成了信息收集，从而筑起高墙保护自己免受其应用造成的问题攻击。演化，如我们早已表述的，明里暗里都在无情地行动着。人类逐渐了解其工程设计活动，就不能假装他只是在收集理论知识。知道自己决定后果的人，获得力量实现目标的人，一定要承担起责任的重担，这对自然演化这位非人格的设计者来说易如反掌，因为它根本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1. 存在信息传递和器官构建方面不统一的过量现象。根据丹科夫发现的原则，演化在最低可能水平维持着基因型传递信息的过量现象，与物种延续和平共处。因此，就好像设计者不那么在意自己所有的汽车正在抵达终点这一事实：如果只是大部分会如此，它将会特别开心。这种“统计设计”原则的成功取决于大部分而不是全部的结果，与我们的思维并不相同。但是，维持低水平信息过量而付出代价的不是机器中的缺陷，而是以有机体内的缺陷为代价，包括人类在内，那情况就非常特别了：每年二十五万名儿童出生就患有严重的先天缺陷疾病。

2. 从个体发育中不消除不必要的元素，和第一条原则相矛盾，即信息节省，甚至到吝啬的程度。先于现代物种存在的久远灭绝生物形式的遗迹被几乎是机械式地携带至今，作为惯性的结果。因此，比如说，在胚胎发育过程中，胎儿重现了早已消失的胚胎发育早期阶段，在发育成人类胚胎的过程中出现鳃、尾巴等等。这些器官被用作其他的生物目的（支气管鳃弓发育成颌骨、喉部等），因此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无关紧要。但是有机体是如此复杂的系统，任何不必要的过量复杂性都会增加不协调的可能性。

3. 存在生化个性就是第二原则——“不必要复杂性”的结果。遗传信息的跨物种可传递性是能够理解的，因为泛杂交，蝙蝠与狐狸、松鼠与小鼠等杂交将会摧毁活生生自然的生态金字塔。但是在单个物种范围内，不同物种基因型的相互异质性继续存在，以系统蛋白的个体差异形式存在。

4. 在当前一代中，如果每一个变化无法立刻发挥作用的话，演化无法通过渐进式改变实现解决方案。同样地，它也无法实现要求彻底重建，而不是进行微小改变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它既是“机会主义者”，也“目光短浅”。许多系统的特点就是设计复杂，否则将无法避免。

9

现代技术在自相矛盾地同时朝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它创造了可以大规模复制艺术作品的工具，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开辟了可以让图像、声音、文本、语音可以在百万分之一秒的瞬间进行传输的信息通道，这也给了曾经无人知晓的艺术家们影响全球观众的机会，这在之前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与此同时，技术作为艺术灵感的来源则是贫瘠的。这里所说的不包括那些有助于创造用以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实用产品的技术领域及影响。比如说，在新型建筑、室内设计及大型城市建设等领域，技术所扮演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某一艺术的分支具有功能性，而其产物又是用于实现某种特定物质目标的工具，那么它就可以在技术中寻求到一个强有力的战友。所以城市、房屋、交通工具、日常生活用品都既可以满足功能需求，也可以满足审美需求。技术是艺术在其起源之处必然碰到并且第一个就碰到的敌人，因为技术本身就是去个体化的过程。

生产的去个性化同样体现在科学领域，那些孤军奋战却做出了许多伟大发现的科学家的时代也逐渐走向终结。在过去，像巴斯德或爱迪生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的命运与个性和他们的成就密切相连。而如今，伟大的发明家、科学家们虽说也并非籍籍无名，但是弗莱明或者汤川秀树的个性与他们的毕生成就之间的联系却变得模糊不清，这是因为，独立发明的概念变成了“传输处理”的对象，甚至是在刚刚出现的时候就以科学报告的形式从一个大洲传到了另一个大洲，这就导致人们很难将第一个发现者与其他学者的贡献区分开。如今的发现越来越多地诞生于更为大型、密集集体协作环境中。

娱乐可以在技术繁荣的环境中蓬勃发展，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娱乐和汽车或飞机一样，都是高效且无个性的。这样的产品由可更换的配件和一套用以引发特定反应的标准化循环系统组成，它们甚至可以呈现出完美的状态，但始终是一个由刻板印象构建的结构。对于娱乐来说，创造者个性的缺失没有任何威胁，然而对于艺术来说，个性却是不可或缺的。在技术社会中，艺术家成了有个性的活化石，多少有些格格不入，当然，他们可能也是被人关注甚至受人敬重的，但是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某种程度上的荒谬可笑。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悬在技术时代每个创作者头上的这种荒谬可笑又是从何而来呢？首先就是数量造成的，物以稀为贵，一个莎士比亚在众人中卓越伟大，而十个莎士比亚顶多就是杰出优秀，然而如果一个地方有两万个具有莎士比亚般天赋的艺术家出现，那就一个莎士比亚都没有了。因为和一小群创作者竞争，把个人的世界观强加给观众是一回事儿，挤在信息通道系统的入口处，和一大群可怜又可笑的创作者竞争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随着创作者数量的指数级增长，“旷世奇才”将不再罕世，而只是一种常态。也许上面加引号的词并不是特别合适，因为如今像历史上的画圣或文豪一样才华横溢的人一定比过去要多得多。

当然也有这种情况，甚至是有时发生，一个不为人知的艺术家，也就是一个没能挤进大众信息通道的艺术家，只能扮演磐石般冷漠而骄傲的孤独者的角色，但这并不应该混淆视听。艺术家并不是一个以独特方式体验世界并尽己所能去表达的人，而是一个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他人的人。在技术时代，艺术性似乎是由特定信息通道的传递容量和才华横溢的人的供应量共同决定的。有才之人的数量越多，其中每个人的处境就越糟。我们在这里谈的不是他们的经济状况，而是他们作品的境遇。真正艺术家的野心都是普世的，他们都渴望自己的作品能跨越地理和民族的界限。而艺术作品的生产者越多，接收市场崩塌解体的趋势就越明显。电视、出版社、报刊、广播、电影等庞大的信息传输设备取代了过去艺术赞助者的角色，但是在操作上，它们更像是掷骰子的玩家，而非敏感的艺术评论家。艺术交易的压力是巨大的，巴黎的“艺术品交易商”们每一季都会推出一位画家，

尽管人们根本无从分辨他和成百上千个才华与之不相伯仲但运气稍逊的艺术家的作品。如果杰出的艺术家凤毛麟角，那么他们每个人的影响力范围与他们所代表的艺术阶层的关系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他们人多势众，那么，提高作品声望的同谋——根据人际关系和随机波动所进行的盲目统计——就会成为艺术最可怕的敌人。谁的作品能够出现在信息通道系统的“入口”，谁就能获得成功——艺术家声名鹊起，当然这是他应得的荣誉，却也使得那些和他才华不相上下的竞争者失去了成名的机会。拓宽信息通道也并不能改善这种状况，因为世界无法在同一时间单位内把数量不断增长的艺术作品全部吸收。任何一个去过博物馆或美术馆的人都知道，过度对于美来说是多么致命的一击。增加信息通道的数量也只会导致接收市场的进一步崩盘，从而导致文化土崩瓦解。因此，在试图去帮助艺术家们的同时，技术其实是在失去他们。因为艺术本身就是文明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根据特定时代最伟大的个体所强加的模式来对思想和情感进行塑造时，它还成为一种力量。

因此，与人们普遍认同的完全相反，即使没有其他阻碍艺术蓬勃发展的因素，有才之人的过量供应，一种艺术性的膨胀，也会为杰出艺术作品的出现带来不利条件。这里必须要强调一下，这种如同“信息雪崩”的现象才刚刚显现。事实上，这也是信息论和心理学领域的一种现象，因为过度刺激对所期望的反应形式的破坏性影响是由一个大数定律所决定的。这一定律也不仅仅适用于艺术领域，众所周知，如果有数量巨大的刺激，并且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会单独触发人类的反应，那它们加在一起，就会在萌芽阶段消除“这种反应”的可能性，正如那些打开集中营（里面囚禁着无数恐怖活动的受害者）大门的解放者身上所发生的：由于可供同情和怜悯的对象过多，这种感觉就会转变为恐慌、无助与迷茫。

艺术家们对于技术加速发展的不信任，甚至敌意，表现在艺术中，不仅是在情感领域，还包括认知功能。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文学。通俗文学和精英文学的分化在西方尤为明显。文学实验成了对那些可以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力量的一种反抗。文学在发现和进步领域中的缺席就是对它们的一种谴责，而且有些时候这些谴责甚至不是无声的。文学之所以能获得历史性的伟大，是因为拒绝容忍人类世界的罪恶。但文学的老对手——社会制度，以及其中形成的人性，都已经被技术的进阶所取代，其去个性化程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想要批判这种进阶，就有必要在文学中使用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它们是大众统计现象的结果，是对我们所生存的世界进行物质开采的结果，它们中那些不受欢迎的部分往往更应该归咎于非人类世界，而非人类创造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对文学比对世界更感兴趣。我并不认为，对自然、宇宙的批评与讽刺无法孕育出丰硕的艺术成果。但无论如何，文学也并没能做到这一点。而且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哪怕是世界级的文学大师所研究的问题本质上也都是边缘的。社会边缘问题曾经是文学的兴趣所在，但是从浪漫主义边缘到精神病理学的边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精神病理学经常会成为才华横溢的人的避难所，因为在这个领域里技术是无能为力的。比起浪漫的疯子，一个白痴更容易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因为低于平均水平比高于平均水平更容易唤回技术时代艺术家心中失去已久的创作自由。理性——对反对无效的基本认识，将阻止群体社会中那些高于平均水平的个体脱离集体轨道的尝试。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智力不发达的人才能通过非理性的行为来表现内心的自由。这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地下室中的那个人，他已经预见到，在“未来的水晶宫”面前，如果别的地方都去不了，那么人就只能躲进疯癫中了。当然，这里说的疯癫不等于真正的白痴病，因为这种疾病的出现是由生活中的现实条件所导致的。

作家想要寻找当代的主人公，这种寻找便会将他们引向那些“独立于技术之外”（比如，有精神缺陷的人）的个体或社会群体，或是技术革命的意外结果（比如，反社会虚无主义，这种思潮正在年轻一代中蔓延）。文学提炼出的“人类命运公式”，不仅可以在宽泛的社会学层面上加以思考，比如“当代的主人公”的问题，也可以在个体的、本体论的层面上进行思考。作为心理学的先驱，文学在这一领域可以说是做出了众多宝贵的发现。这一问题又是如何呈现的呢？在技术时代，还可以将“人类奥秘”视为对自身存在的不了解吗？文学还是照亮这一奥秘的璀璨光源吗？然而“人类奥秘”究竟又是什么呢？可以将其理解为意识从特定的物质结构中萌生的奥秘，但这属于科学哲学研究范畴内的课题，而非艺术家要谈论的课题。也可以按照过去两个世纪中的文学传统来探讨这一奥秘。在文学面前有两条可行之径：要么展现个体的精神生活，仿佛它并不只是一个内在的整体；要么就更加明确地展现出控制行为的力量是隐秘的，是在清晰的意识世界的围墙之外的，因此，被支配的人也许并不知道这些力量的存在。第一条描述出的路径，幼稚、简单，甚至是虚假的，只有三流作品才会这么用。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描述的演变方向是放弃主人公那种不恰当的完全自知，因为不符合现实，这种完全自知简而言之就是：作为存在，他永远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

表现出主观体验流（“意识流”）的不完整性和碎片化成了最重要的事。很有可能，许多杰出的艺术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么做在“方法论”上的理由。他们只是将通过内省所理解到的事物状态表现出来，但由于他们的敏感性和洞察力超出常人，所以能够越来越准确地将内在真相从完全自知的假象中提取出来。矛盾的是，进步就有赖于这样的自我限制，即向更为忠实地表现精神真相“原貌”的方向靠近。然而这条路同时通向的是沉默总量的增加，这是精神行动和决定的最高审判。福克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人公对自己的了解远不如巴尔扎克作品中的主人公，因此他们与我们更像，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最终驱动力究竟在哪儿。因此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去探讨已经发现的“人类奥秘”。然而它究竟是什么呢？是通过演化塑造而成的大脑结构的心理后果。在很大程度上，人都可以对自己的行为编程，并做出选择。然而，这种自我编程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仅仅依赖于内部世界的“物自体”。这种选择通常是由那些大多存在于有意识的自省领域之外的因素所决定的。恰恰是在这一领域之外，隐藏着主要的驱动力或推动力，这些力量先后被不同的学说命名和分类：先是宗教教义，然后是哲学体系，最后是心理学学派，其中以精神分析学派最为突出。

在今天看来，这些教义和学派的方法比较原始：都是以通过人格化的投射（比如人体内的“魔鬼”）、频繁使用的隐喻（“黑暗”与“光明”的力量），以及虚构的存在，其启示性作用使得它得以普遍运用，人们开始认为它们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东西（比如把史密斯的“意志”视作某种类似于他的肌肉的组织），最终就发明了各式各样的伪科学建构（比如精神分析中的自我、超我和本我）。无论这一切解释性活动有着怎样悠久的历史传统，都经常会偏离基本动机和经验机制的认知轨道，而无法做到真正的识别。正如我们所预计的那样，这里要提到的最后一个词就是神经生理学，一门运用来自生物控制论和信息论的严密手段的科学。用这门科学的语言来说，“人类奥秘”及人类“对自身的不可知性”只不过是这种控制组织的结果，也就是说，大部分编程选择机制对于其载体或其所有者来说是触碰不到的，而且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触碰，也无法控制的，就像我们无法直接调节心率或者血压一样。使得人类在监控意识运行上如此无能的那些决定性因素，作为中枢神经的影响因素已经延续了几亿年，而非短短几个世纪。另外我们需要补充一点，那就是，从现代的、人类的角度来看，并不是这个最终构造的每一部分都值得肯定。不过这又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演化方案批评的问题了。我们现在谈的是由演化“造就”的人。大脑是所有身体活动过程（也包含大脑本身）最高级别的调节器和指引者。这些身体活动过程中的一部分是需要自省审视和有意识的控制的，然而这里我们不得不强调，那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但这两个领域（有意识的控制和无意识的控制）之间也并没有隔着什么无法逾越的屏障，从结构上来说似乎就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切塑造意识、填充意识的东西，虽然都源于意识之外，但并不在身体之外（即不是来自外部环境），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人类奥秘”：人自在其中却对自己一无所知。通俗点来说，人就是“身体”和“精神”。实际上，这样说并不全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身体（“我们可以感受到”），通过类比我们也知道我们有“精神”（意识），然而我们还有“其他”部分——这一部分难以通过主观去感知，但它却既控制着我们的“身体”，又掌握着我们的“精神”，精神分析学将这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并非全部！）称为“潜意识”。

这就有了一个悖论，或者说一个表象，认为自省认知与主观经验一样，都是全面而且完成的，但人并不是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能够感知到他的判断是由他有意识的动机和其他动机——他自己意识不到，但就像一种无法定位也难以名状的力量，影响着他的判断——共同决定的。事实绝非如此。相反，通常情况下，做决定的人认为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或那样做，因此令他做出这样或那样决定的因素对他来说是一览无余的。然而，这种自我认知经常是错误的，只是一种幻觉，因为没有什么能够比我们的意识更频繁、有效、全面地欺骗我们了，特别是在涉及行为的动机及其内容时。然而事情并不总是这样。有时候，影响决定的因素作用于明确的意识领域之外，并与意识的内容大相径庭，让人感觉它是一股压倒性的力量、一种无法抵御的“诱惑”、一种不可抗拒的压力，这时，这部分不受自省控制也无法在有意识的领域中找到其源头的支配力量，就特别容易被人格化（比如“魔鬼”）。对于意识来说，它是一种源自意识之外，却又并非来自外部世界的力量，因此也就显得格外神秘。最后，简而言之，意识就像是一个舵手，被安排去驾驭一个比他自己还大的船舵，也就是整个大脑。人，就其本身而言，是现有的意识内容，以及对隶属于它的信息“配件”（比如记忆）和执行“配件”（顺从的身体与精神装置，比如人可以让自己的腿动起来，也可以让“大脑里”播放乘法表）的固有知识的总和。所以对于人本身来说，人就是意识，但又不是全部，因为通过自省，人类可以完全了解自己意识的控制特点，同时又对那个更大、更高的控制系统知之甚少。大的系统包含“小”的系统，也决定了一个人的智力水平，以及他的信息流通偏好系统（通俗来说，就是一个人的个性），但只靠深度挖掘自己的精神世界并不能让人了解自己，他必须要观察自己的行为，而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行。

夸张点说，人类的际遇和命运就如同一名将身家性命全都交给一辆车的赛车手，他完全不了解这辆车的性能，却又要对整个赛车过程中的一切后果负责。也就是说，他要对“赛车手+陌生的机器”这个组合的表现负责，虽然他只好做了对自己负责的准备，因为他对这台机器一无所知，又上哪儿知道它会带来什么后果呢？这台“陌生的机器”——一个让它的拥有者对其性能一无所知的控制系统——就是我们的大脑。笼统地说，这里所谓的“陌生”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不符合日常习惯、超出寻常轨迹的特殊情况下展现出来的，比如说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时，没人知道它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这时，这个对其拥有者来说完全陌生的控制系统的参数，就会毫无预兆地显现为这样的事实：意识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随波逐流，无法自控。（比如在一艘快要沉没的船上，或是集中营的焚烧炉前，人们会做出自己之前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行为，或是表现出他从来不知道自己具有的美德。）严谨起见，让我们补充一下，这种“短路测试”不能展现出“真正的精神品格”，因为凌驾于意识之上的控制系统的参数并非恒定的，而是未知的。当然，在某个特定的个体之中，它会具有某种倾向性，然而，这种价值取向并不是固定的，会在某一个范围内震荡。一个在庞大的控制网（也就是大脑）中经常会被掩盖的统计因数有相当大的概率在“短路测试”中出现，因为提前做好（如有必要）的行为编程和偏好系统，到最后往往是无用的，哪怕是对大脑的运行机制和动态过程有着充分了解的研究人员，在“测试”前也一定无法预测其应用结果，顶多是列举一些可能的数据概率罢了（比如，个体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表现）。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是因为上述这类可怕的尝试，经常出现在现代或是不算久远的过去，为他们的艺术性描述制造了巨大的困难，因为这就引出了个体行为的不可预测性，从而打破了已知的人格形态。对于那些每个作家都渴望成为的“灵魂专家”来说，最可怕的往往不是人会变成野兽，而是这种变化会让他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惊讶，心中还会留有杂糅在一起的负罪感和无辜感。

非常有趣的是，这种能让一个文明人接受一切暴行，哪怕是自相残杀也不在话下的行为突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被当作事实认可，也没有被纳入人类心理学知识的范畴。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中东欧在“二战”期间经历的这些暴行，在历史上绝非孤例。很有可能，沉默就源于整个文化发展的传统，这种发展旨在确定某些无法估量之事、某些规范，以及那些社会理当绝不也从无超越的禁忌。这一传统创造出了人类内心精神的某种特

定模型，作为一个连续且相对有序的系统，以及最重要的，作为一个固有的整体，与对人类行为的任何统计学或“耐力”（这里指的是，道德律是控制的特性之一，和其他特性一样，也会发生变化）的解释都是不相容的。

人是在社会生产出并认同的行为模式范围内活动的，然而人的神经网络、中控系统及其随机统计成分均作用于大脑活动的各个层面上。低级执行结构越多，我们的思考就越连贯。一旦被决定触发，它们就开始非常精确地相互咬合并付诸行动——精准同步的刺激如雪崩而至，而这雪崩的触发装置往往是通过概率演算来管理的。意识是什么？是竭尽所能的精神秩序守卫者。是“欲望”和在个体历史中形成的平均行为模式相对峙的典例。是在必要时可以施加约束、踩下刹车的力量。是一片永不休止地为一致性和连贯性而战的战场。而且，说实话，与其说它是这样一个地方，倒不如说是人们把它塑造成了这个样子。如果一个车手的经验丰富且技艺高超，就能驾驭一辆“不负责任”、有缺陷的赛车。这种比喻可能比我们所认为的更接近事实。一个由数十亿零部件、成千上万的线圈组成的巨型内稳态调节器中很容易出现局部活动中心，而这些活动中心又经常是相互对立斗争的。想要通过直接切断电源的方式来抑制不需要的信号的产生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因为只需切换相应的刺激就可以将其引入新的路径。真正有必要的是搞清楚这些路径究竟在哪儿，要如何切换刺激。总而言之，车手应该了解自己赛车的特性，人应该了解自己，以及自己的“奥秘”。人可以学会“驾驭自己”，就像车手驾驭性能不佳的车一样。

总之，我们已经以一种零碎而又非常浅显的方式，介绍了技术给文学发展所带来的危机：从艺术的源头到艺术的结果，技术都在攻击着艺术。甚至技术的“大脑”——科学，在这里一领域中都不是中立的，研究精神现象的学者们也对文学造成了威胁。然而，令处境更为艰难的就是，从主流观点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学，并不完全了解这些现象产生的机制，至少并不是很清楚危险来自何方。让我们祈祷它能够得胜凯旋，如同凤凰浴火重生，以新的形式和内容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它不会弃我们而去，因为如果艺术离我们而去，那么一个技术全面胜利的辉煌时代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投诉

© 本文版权归作者 朱俊帆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1人阅读 编辑 | 设置 | 删除

有用 0

没用 0

赞赏

收藏

转发

回应 转发 收藏 赞赏



添加回应

☐ 转发到广播

加上去